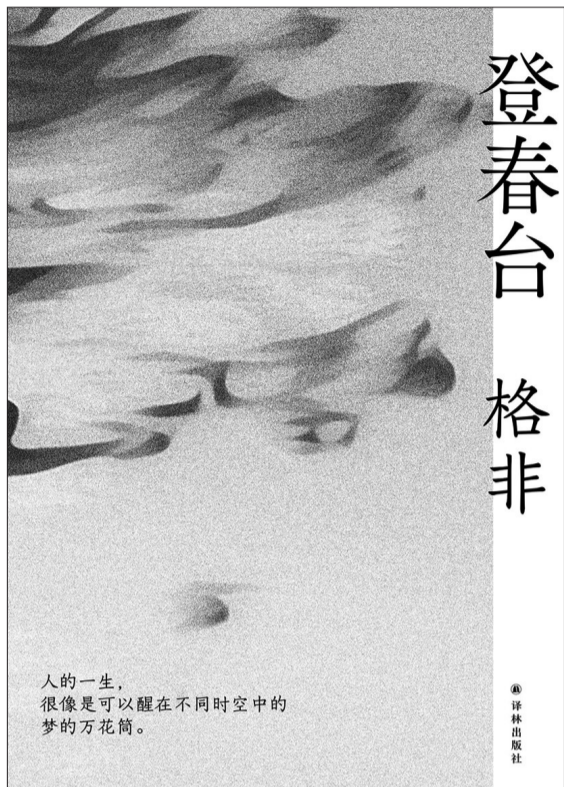


格非《登春台》叙写四个人物四十余年的命运流转 他在大街上观察陌生人的脸



人的一生，
很像是可以醒在不同时空中的
梦的万花筒。

登春台
格非

《登春台》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2024年3月

每个人降生的那一瞬间，都是极其相似的，但离场的方式各有不同。

宇宙中充满着各种基本粒子，像什么夸克啦，轻子啦，规范玻色子啦，希格斯玻色子啦，还有什么引力子啦，不一而足。它们一刻不停地微弱振动，赋予天地万物以能量。如果我们将这种振动的规模放大无数倍，即可想象出钟摆或秋千的振幅和频率。同样，像万花筒般运行的天体亦复如是。正是它们机械的、周而复始的旋转，才转出了寒暑推迁与昼夜相代。天体的转动和四季的交替，也会给我们带来某种恒定秩序的幻觉，我们称它为时间——毕竟，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全世界的人是以太阳所处的位置来确定时间的。如此说来，我们对于时间的奇妙体验，不过是源于一个永恒复归的“大秋千”的来回摆动所导致的轻微眩晕或迷醉。当然，只要你愿意，也可以认为时间根本不存在。

话虽这么说，我们还是得交代一下故事发生的大致时间。

那是2019年的10月8日，农历九月初十。

时令虽然已交寒露，天气仍有几分燥热。上午九点半，中关村软件园国际会议中心东侧的马路上，走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老者。这人瘦高个儿，身穿藏青色的短夹克，卡其色的休闲裤，头戴一顶草编遮阳礼帽。这人名叫周振遐，退休前曾担任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的董事长。他沿着上地西路由北往南，不紧不慢地踽踽独行。

当他走到上地西路与上地九街的交叉口时，不由得停下了脚步。数不清的员工大巴一辆接着一辆，从城市的各处汇集到这里，吐出一批又一批上班的人流，将马路的丁字路口塞得满满的。这些人大多一边往前走，一边浏览手机信息，也有人大口吞吃着刚刚在路边摊买来的煎饼果子，行色匆匆地绕过旗杆下的喷水池，朝着软件园东大门的方向疾速移动。在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那些骑着黄色、青柠色共享单车的年轻人，焦躁地打着响铃，而像潮水一样漫上路面的人流对此却听而不闻。人群中偶尔也能见到将头发染成褐色、酒红色或蓝色的时髦青年，他们因脚下踩着轮滑，即便静立不动，也能缓缓飘移，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

所有的人都心事重重，神情肃穆，且彼此之间从不交谈。除了不时传来的几声汽车的鸣笛之外，你甚至听不见杂沓的脚步声，四周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寂静。

周振遐索性在路边的一张白色铸铁长椅上坐了下来，等待人流退去。

姚岑去广州参加侄子的婚礼，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意识到，所谓无聊的时刻，就是人们感觉到时间如何过去的那个时刻。可时间偏偏不想过去，而他既没有任何方法去驱逐它，也没法去填充那个深渊般的虚空。因此，他想给自己找点事情来做。比如，他可以去离家不远的金地

花卉市场转转，顺便买一卷用于牵引和固定花木枝条的铁丝线圈。另外，二楼茶室里的那两盆建兰，叶子有点泛黄，且长出了焦斑。他想去请教一下专卖兰花的邢师傅。

姚岑刚从白云机场打来了电话，她乘坐的航班即将起飞。等到他逛完花卉市场，去附近的北平精酿喝杯啤酒，再次回到家时，没准姚岑就会来给他开门。

虽然两人只分别了四五天，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

因为忘了带烟，当他坐在长椅上感到昏昏欲睡时，抽烟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

在大街上观察陌生行人的脸，是周振遐多年来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习惯。揣测、虚构、臆想这些人的命运，并非出于什么恶毒的用心，更多的是源于某种悲悯。在这个彼此模仿的尘世上，别人也是自己。

他上了年纪且心智正常，没法不时常想到死亡。俗话说，智者之死，与愚人无异；贫者夭亡，与富寿者相埒。大街上的陌生人从他身前走过。他们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贫穷或富有，或踌躇满志，或心灰意冷，各有各的命运。

真正的穷人为生计忙碌。他们熙来攘往，旅食奔波，脚步一刻不得停息。他们很少像智者和哲人那样思考死亡，仅仅是因为他们被劳作的绳索所束缚而无暇他顾。他们忍受贫穷、屈辱、不幸和痛苦，即便一贫如洗，燃烧在他们心底的那盏希望之灯，也从来未曾熄灭。他们生活在世界的暗面，不被关注和观看，仍试图从简单、粗劣和严酷的生存中，辨别是非善恶，维持着对这个世界的一线信心。在不很遥远的过去时代，穷人不受文化的节制，乐天知命，视死亡为平常之事。但世界随后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重组、颠倒和置换。他们从林泉山野被置换到了城市的周边，沦为无根之物。如今，知识和时尚的暧昧光影终于擦上了他们，并将他们牢牢箍住。尽管他们无暇从容检视死亡，仍不免会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数年、数十年后，从这个世界消失，堕入绵延的黑暗。有时候，他们只是坐在椅子上微微打了个盹，就已归到死人那里去了。

当那些保养得很好、养尊处优的有钱人或成功人士从你身边经过时，你很容易一眼将他们辨认出来。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衣着散发着限量版或私人定制的“贼光”，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眉宇中通常有一种不属于与一般人计较、跳脱于芸芸众生之上的超然和优越。他们的与众不同，往往体现在他们优雅健美的体态和身形上。在今天，身材是否匀称，成了成功人士区别于失败者的重要标识。他们日复一日生活在很不健康，乃至极为病态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中，却将健康视为生活中唯一的宗教。钛合金的瑞士种植牙、钴铬钼合金的美国置换膝关节、德国蔡司人工晶体眼球以及诸如此类的现代医疗科技产品，为他们的衰老留住了最后的体面和尊严，而对身体指标的严密监测和未雨绸缪的提前干预，也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罹患致命疾病的概率。就算有人运气不佳而身染重病，通过被俗称为“上手段”的极限治疗，依然可以长时间续命。因此，这些人比顶尖科学家更相信基因和生物科技的无所不能，更相信现代医疗科技在可见的未来能够使他们至少活过150岁，直至获得永生，成为不死的人。

真正意义上的名流、社会显达以及特殊群体的神秘人士，很少现身于街头的人群之中。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他们通常在新闻、传说或流言中存在，并供人瞻望。死亡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也有些特别。一些人在切开喉管之后，仍能支撑十数年，在没有知觉的昏睡中轻松迈过100岁的门槛。他们从公众生活中退场之日，一般说来已经历了一次死亡——世人提前将关于他的信息从记忆的硬盘中删除，以便容纳或储存后来者的荣耀、事迹、丑闻或劣行。因此，当这些人死亡的讣闻，出现于报纸的一角或手机微信的朋友圈中，公众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悲伤，而是时空错乱所带来的讶异与疑惑。因为，在公众的心目中，这些人早已死去多年。

在过去，大多数人真正意义上的消失或寂灭，多半在肉体死亡的数十年后悄然来到。其标志通常是墓碑无人擦拭，墓园无人祭扫，与死者相关的所有人和事，皆在时光的流转中湮没无闻。然而，时至今日，微信社交平台的出现，使得这一自然的进程骤然加快了速度。每逢有人离世，亲友或知情者旋即死者的讣闻发到朋友圈，以便获得关注，并集中表达哀悼、缅怀与赞美。转发的密集度或评论的数量因人而异。

内容简介

《登春台》是格非睽违四年推出的最新重磅长篇小说。小说叙写了1980年代至今四十余年的漫长时间里，春台路67号四个人物的命运流转。在这里，藏着某种将世间万物联系在一起的神秘逻辑。众人熙熙，如登春台。

作者简介



格非

1964年生，江苏丹徒人。中国当代作家，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望春风》、《月落荒寺》等，中短篇小说《褐色鸟群》《迷舟》《相遇》等；另有论著和散文随笔《雪隐鹭鹭：〈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博尔赫斯的面孔》《小说叙事研究》《文学的邀约》等。2006年获鲁迅文学奖，2015年获茅盾文学奖，2016年获年度中国好书，2021年成为首位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的中国作家。

国学之道(9) 之思想观念

如果你要站在今天多学科的视角上去评判中国古人的思想，那么必须又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将西方人他们“自说自话”的思想中的道理和精神“原貌”呈现出来。在两个“原貌”都客观呈现出来以后，再去进行两者的“比较”。西方人在发展他们的思想时，可能多数情况下是按照他们的传统去“自说自话”吧，即他们很少将中国思想用来帮助他们建立什么新思想吧。现代西方一名著名哲学家曾深刻地指出“西方2000多年的哲学史都是对于柏拉图思想的注脚”。当然到了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例如莱布尼茨、海德格尔等人也会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但我们中国，而具有了较之于西方人“开放”多得多的态度，自觉地进入不同文化思想的“比较”乃至“融通”的工作。当然这种比较和融通，绝对不是以谁去“范”谁的问题。我们会站在一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人性光辉的呈现究竟“应该”怎样才会“更好”“更合理”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不同的文化思想的“优长”所在。还是那句话，这项工作的开展一定是建立在准确了解各自文化思想的“自说自话”出的那些东西。

如果你说中国科学不发达而西方就发达，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如果你找到了“哲科思维”，或说是“形式逻辑”是促使自然科学进步和发展的本质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理性地冷静地接受，并虚心补上这一课。但同时，当你把问题引向文学、艺术、心性、生命等问题时，中国自古以来所具有的文字、思维方式恰又是促使中国传统文化进步和发展的本质原因。你说中国人没有语法，但我们写出那么多美文诗词正是靠着它，有何不妥呢？通俗地说，西方文化有所长，有其侧重，有其传统，例如在纯粹形式的逻辑、数理等问题的构建和探讨上就是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这里当然具有太多、太重要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在许多领域已经并将长期显示和发挥着这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积极和正面的作用，从而对人类社会文明，尤其是科技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继续发光发热。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要想建设起物质文明的另一个，那么就无法忽视西方文化中的这些因素。但另一个问题随之呈现并需要回答和解决，那就是任何一种现代文明的建设又需要精神文明的建设，而在这一领域中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明则有着太丰富的内容和传统。关于这一点被西方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很早就揭示出来了。在他看来，在思维的深邃和理论学科方面，欧洲文明更胜一筹；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中国则远胜欧洲；而在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用技术及以实验的方式与自然打交道的能力上，两者不相上下。他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并积极主张通过中西文明的交流以造福人类社会。这无疑是一种非常智慧理性的认知，然而在西方文化圈内这种认知是不多见的。

这里自然就引出一个不同文明内容和形式是否需要互鉴的问题了。而一旦将问题归结于胸怀以及思想观念时，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延续不断的忠恕、宽容、包容、和合、大同等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当然地就具有了她的优势，自然要走向前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能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非对象化的整体性的“道器不二”“天人合一”思想在人性问题，在生命问题上的特殊作用，只能站在适合创造出这种理论的思维方式上去理解。比较的工作也是在将各自“自说自话”的“理论”及其“思想观念”完全客观全面准确地呈现出来，然后再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高度”来进行分析对话。要弄清楚各自是就什么“对象”和“问题”进行探究的；各自探讨出的“智慧”分别对什么样的问题有“作用”。找到“阴”与“阳”各自的优劣在哪里，然后进行“冲”，即“调和”。而且这种“冲”是要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具体情况的随时“改变”而进行的工作。仅就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和余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语），此之谓也。

其大者“先立乎”以后，再回过头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中的形上观的气论和道论就有了方向和目标了。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148)